

当代中国老年人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 存在性及支持强度分析*

郭春燕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100124)

[摘要]为考察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广度和深度,并洞悉其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影响因素,基于CLASS 2014—2020四期调研数据从子女向上经济支持的存在性、绝对支持强度和相对支持强度这一新的视角进行分析。首先,目前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在中国仍然普遍存在,而且城乡之间无显著差距,但支持强度有下降趋势且城市快于农村,其中绝对强度的下降主要来自子女对父母的高额资助减少,相对强度则缘于老年人自身经济收入的大幅提升。其次,子女向上经济支持行为的存在性对应中国孝道文化模式的投射,理论上主要依托于责任内化论,支持强度则量化表征子女的经济赡养行为方式,其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分别对应微观和宏观的度量,分别借助交换论和需要论进行阐释。这三者受同一个体特征的影响反馈存在不同:例如老年人收入特征对存在性和相对强度呈“挤出效应”,对绝对强度则反映出交换论带来的“挤出效应”;子女数量是存在性的基础,对绝对强度呈倒U型,对相对强度存在城乡差异;双向经济支持关系较复杂,对存在性和支持强度的影响分别不同等。这些个人特征给子女的向上经济支持行为带来的影响,其城乡间差异更多体现在影响强度上,在影响方式上二者基本一致或因城乡经济差异而不同。

[关键词]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 存在性 支持强度 城乡差异 广义线性混合模型

[中图分类号]C913.6; 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4-0115-13

一、问题的提出

1994年中国大约有57.1%的老年人是由家庭成员提供主要生活来源^[1],2010年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该比例为40.7%^①,2020年七普数据中继续下降为32.7%,近二十五年下降了25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近一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宏观上的下降在城市和农村都存在^[2]。家庭

养老既是一种文化模式又是行为方式,文化模式体现子女对父母的一种赡养责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而行为方式会随社会发展变迁而变,二者不能混为一谈。^[3]因此当代社会中家庭养老的文化和行为是否均发生了变化呢?具体而言,在社会保障程度较高的城市,大部分老年人的经济比较独立,那么子女是否仍然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支持的强度如何?

收稿日期:2025-05-22;修回日期:2026-05-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乡融合发展的统计监测与优化路径研究”(22BTJ067)

作者简介:郭春燕,讲师,主要从事老龄化及养老金体系建设研究。

①该数据由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长表数据”中的“第八卷老年人口”表8-4计算得到。

而在农村,自从2009年“新农保”政策实施,社会养老金已经成为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之一,而且成为农村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的占比已经从2010年的4.6%提升到2020年的10.4%,那么受此影响,现代农村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状况又如何呢?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村人口特征上存在差异,那么这些差异是否会影响到代际支持的不同呢?鉴于此,本文将从城乡差异的角度分析中国当代社会中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的存在性和支持强度。

二、文献综述

老年人的家庭代际支持意味着老年人的生活或经济来源由家庭成员提供,尤以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为主,因此本文中家庭经济供养、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或经济资助等说法之间不做区分。接下来从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存在性和支持强度分别做相关文献述评。

(一)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存在性

首先对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存在机制,社会交换论认为子女对父母的赡养行为是子女将父母的养育之恩,以经济、劳务或精神上安慰的形式回报给他们^[4],并强调子代和父代之间的互惠和均衡性,从而在不同赡养形式上彼此弥补。另一种适合中国国情文化的理论解释是责任内化论^[5],该理论认为受几千年儒家文化对孝道的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已经变成了中华儿女内在的责任要求和自主意识,已成为人格的一部分;而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传统孝道的嬗变成为家庭养老弱化的争议点,有的认为中国当前孝道中蕴藏的崇老文化正在衰退^[6],有的认为传统孝道将适应现代文明社会转变成新孝道^[7],例如二元孝道:权威性孝道和互惠性孝道^[8],并且二元分化特征明显^[9]。如果将社会交换论和责任内化论综合在一起,那么中国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互惠基础除

了血缘关系的纽带外,还有所处的社会文化和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第三个是需要论^[10],该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的首要责任是满足其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包括生理的、社会的、情绪的和精神层面的需要,而老年人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要通过家庭、市场和社会福利机构的供给才能满足这些需求;并且这些供给方互相之间具有“填补”作用。这也与西方学者提出的利他主义^[11]相似,在利他主义下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是为了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也意味着一旦父母的生活来源有其他供给方,比如说社会养老金,那么子女就会减少对父母的经济赡养^[12],或者反过来站在子女的角度看,他们对父母的经济供给“大体相当于‘填补’年老父母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金额与其各种非子女经济供给金额之间的‘缺口’”,而这正是老人经济供给的“填补”理论^[13]。由此可见,需要理论、利他主义和“填补”理论三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国外文献对这些理论影响机制的经验数据实证启动较早成果也丰富,从单一地支持交换动机^[14]或者利他主义^[15],到深刻认识到动机的发生与父母的经济状况有关^[16]等,结论不一。国内的研究历程与此相似,实证检验多基于交换理论阐释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惠关系^[17-18],或者利用需要理论解释子女的经济填补支持^[10,19]。更深入的结论也认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的发生动机与父母的经济状况有关^[20],当农村父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则子女的经济供养以利他动机为主,反之,则是交换动机为主。另外,当前孝道文化嬗变的实证研究也渐成热点。^[9,21]

对于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做出专门研究的文献不多。一般文献认为,只要实际样本数据中子女具有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那么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行为就是存在的,因此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的量化指标有两种:一种是建立在老年人的角度,即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在样本人群中的占比^[22];另一种是度量子女样本中有向上经济支持的人

群占比^[23]。另外,学者更关心的是具体某一种或者一系列因素对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的影响,比如子女性别^[23]、子女流动^[24]、子女数量^[25]、新农保的介入^[26]、综合因素或双代特征^[19-20]。

(二)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强度

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经济独立性的逐渐增强减少了对子女的经济依赖,这是家庭养老强度弱化的一个表现。这种弱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不意味着任由家庭养老一味地弱化下去,家庭养老要掌握一个合适的“度”^[3],老年人对子女的完全依赖或高比例依赖会给子女带来沉重负担,而适度的家庭养老既可以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又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情感慰藉,有助于调整代际关系,巩固传统的反哺模式。因此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在当前中国仍具有重要作用,尤其在农村地区。鉴于此,学术界对代际经济支持强度的研究有增多趋势。首先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强度的衡量有几种,一种是最直接的刻画指标,即子女给父母的经济支持数额,这是大多数实证文献使用的度量方式^[27],也有考察该绝对量在老年人所有收入来源中的占比^[28],以上两种属于微观范畴,还有一种是宏观范畴上的度量,即代际经济支持在老年人生活来源上的地位^[2],如果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是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意味着老年人的大多数经济来源都要依赖于子女的给予,反之,老年人经济越为独立,子女的转移性收入就越不会成为主要生活来源。因此,在能够满足老年人生活基本需要的前提下,只有当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强度高到一定程度才能成为父母的主要生活来源,所以观察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源自家庭成员的人群占比变化,即可从宏观上反映代际经济支持强度的变化。

老年人的经济来源和老年人所处的家庭结构是影响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主要因素,它们的变化导致支持强度的变化。社会福利的完善增加了老年人的外来经济来源,逐渐脱离子女的直接供养,但是由于我国养老保障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社会养老金对于城乡老年人的家

庭经济供养影响结论不一。城市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被完善的城镇职工养老金一定程度的挤出几乎是定论^[2],但是起步较晚、保障程度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金或者新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影响仍处于争议中:有的认为正向挤入作用^[29],有的支持负向挤出效应^[30],有的得出无显著影响的结论^[31],或者具有地域效应^[32]。另外,目前其他老龄保障政策的实施也带来新的影响因素研究点,例如医养结合政策^[33]、长期护理保险^[34]、居家养老服务^[35]等。

家庭结构层面的因素集中于子女数量、子女的外出流动、子女的收入水平等。子女数量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因素,基于中国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背景,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研究基于相同的调研数据却得到相反的结论,近几年的实证结论也参差不齐,有的支持子女数量越多老年人得到的经济支持越大^[36],有的则认为无影响^[37],而且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逐渐步入老年,对于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实证研究也开始涌现^[38]。人们的空间距离反映并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距离,居住的聚散将直接影响到家庭养老功能问题。^[3]代际经济支持虽然不受空间限制,但是子女与父母的空间距离却是会影响到代际经济支持的强度。^[39]子女给父母经济支持的基本前提是子女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收入,而且经济较富裕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资助力度要更大。^[40]如果站在交换论的立场,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是为了报答父母早期对于自己的各种教育投资,那么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就会加强对于父母的经济支持,理论上是这样,城乡数据实证也如此。^[38,41]

(三) 文献评述

当前文献对于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研究颇多,成果非常丰富。但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即子女代际经济支持这种行为要从存在性和支持强度两个角度分别分析,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分别对应文化模式和行为方

式。从代际经济支持的发生机制看,基于父母子女之间的互惠或者孝道文化的维持,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资助强度可能随社会发展而减弱,但不意味着这种行为的消亡,也就是说虽然强度上降低了,但存在性仍然稳定;除非子女给父母经济资助的人群减少或逐渐消亡,才能说明存在性的没落,此时则需要多加警醒和积极挽救家庭养老这一模式。另外,从利他主义的动机看,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代际经济支持强度的下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但是仍然需要我们明晰当前的支持强度状况,以便于调节适应中国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当前研究对于影响因素的分析没有区分城乡上的差异,只是聚焦于城市或农村的其中一个,二者之间缺少对比。同时,当前研究所使用的实证数据多是一年的横向数据,不能反映社会发展时间变迁这个重要的大环境因素。

三、研究思路及样本、概念说明

(一) 研究思路和样本说明

老年人的家庭经济供养,也就是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是一种双方行为,老人和子女的个人特征都在影响这种行为。老年人是否得到过子女的经济资助和子女是否给过老年父母钱财将是目标变量,描述分析和个人特征分析都将围绕此展开;对于支持强度的目标变量则设定为两种,一种是微观视角的绝对强度,即老年人收到的子女资助总额度和子女给父母的钱财额度,另一种是宏观视角下的相对强度,即子女的经济资助在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的排位。这些分析都将考虑城乡的差异。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分析样本将设置为两个,分别以老年人和老年人的子女为主体。老年

人样本涉及老年人的性别、年龄、个人年收入、养老金、养老规划、子女个数、时间、养老依赖、老年人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等特征,子女样本则包含子女的性别、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有无工作、子女养老被指望度、居住远近、得到父母的经济支持等特征。本文将重点分析这些个人特征对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存在性和支持强度的影响方式以及在城乡上的差异。

研究使用的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项目(CLASS),CLASS在2014年开展全国范围^①基线调查,得到样本11511个,随后又在2016、2018和2020年对基线对象进行追踪调查,并增加新个体以保证足够的样本量。为了观察代际经济支持随时间的变化,本文选取2014、2016、2018、2020四个年度的调研数据,其城乡^②分配见表1。由于2020年问卷数据的部分特征(例如主要生活来源)缺失严重,而且子女部分设计与以往不同,故老年人为主的模型分析部分只使用2014、2016和2018三个年度的调研样本。

表1 四个年度的样本量

CLASS样本	总样本量	城市样本量	农村样本量
2014	11511	6907	4604
2016	11471	5115	6356
2018	11418	4889	6529
2020	11398	4607	6100

在以老年人的子女为主体的样本中,选择CLASS 2014、CLASS 2020中涉及的所有子女分别为2014子女库和2020子女库,这两个样本用于存在性和支持强度的描述分析;建模样本则选取CLASS2018中没有被CLASS2014包含的老年人个体对应的子女构成CLASS2018(不含2014)子女库,以及2014子女库作为辅助对比样本^③。

(二)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和支持强度在样本中的分别定义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是指老年人得到

①覆盖省市不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海南、新疆和西藏。

②2016、2018和2020中城乡的划分由问卷中的户口性质问题决定,回答“非农户口”或“由非农户口转成的统一居民户口”归类于城市老年人,回答“农业户口”或“由农业户口转成的统一居民户口”归类于农村老年人,2020年的问卷中回答“其他”则视为缺失数据。

③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2020年的子女部分问卷包含老年人的10个子女,而以往问卷是5个,并且部分特征设置不同或者缺失严重,不利于建模及对比。

过子女的经济支持或者子女对父母有财物的资助,在本文中分别用老年人是否得到子女经济支持和子女是否有向上经济支持两个0~1变量进行刻画,分别记为if_receive和if_up。对应问卷中的“过去12个月,这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该问题对应的子女如果反馈“没有给过”,那么该子女的if_up取值为0,否则取1。如果有记录的前5个或者10个子女都回答“没有给过”,则if_receive取0,即没有得到子女的经济支持,反之取1。^①还有一种情况是某些个体的子女健在数量信息缺失,但是问卷中的“您最主要的两项生活来源”中填写“子女资助”,这样的个体对应的if_receive也取1。

如上所述,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强度有两种方式体现,一种是绝对强度,即存在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前提下,老年人从所有健在子女那里得到的经济支持数额(记为receive_value)或者某个子女给父母的经济资助数额(记为up_value)。问卷中的“过去12个月,这个子女有没有给过您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其反馈选项包括:没有给过、1~199元、200~499元、500~999元、1000~1999元、2000~3999元、4000~6999元、7000~11999元、12000元及以上^②,除了“没有给过”记为0外,其余各组使用组中值代表大致的财物支持价值,子女给父母的财物价值越高,也即对于父母的经济支持强度越大。receive_value的取值对应于老年人所有具有向上经济支持的子女对于该问题的反馈组中值之和,up_value则对应具有向上经济支持的子女在该问题中的反馈选项,此时使用1~8的定序数值代表上述除了“没有给过”外的8个选项。因此根据问卷设计的反馈方式,receive_value是一个非0的数值变量,up_value则为1开始的定序变量。

另一种是相对强度,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相对其他生活来源的排位。如果子女的经济资助排在老年人生活来源的第一位,那说明子女给老年父母的钱财要多于其他外部来源。这是从微观的角度观察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强度,同时也更能直观贴切地分析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在当前社会老年人经济供养中的重要性。这种排位在CLASS问卷中对应问题“您最主要的两项生活来源是(按重要程度排序)”,因此本文的相对强度是指子女资助在老人生活来源中是否排到第一或第二。

四、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和支持强度的描述分析

(一) 存在比例的描述统计分析

研究基于四个年度的老年人基本库,分别删除无健在子女以及信息不完整的老年个体得到用于描述分析的四个样本,然后分别计算有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在样本中的占比,也就是if_receive=1的占比;另一方面,基于2014和2020两个子女样本库,以子女为主体考虑具有向上经济支持行为的子女在所有子女中的占比,也就是if_up=1的占比(结果如表2)。

表2 子女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在各样本中的存在占比

主体	样本	全部	城市	农村
以老年人为主体	2014	0.89≈10153/11354	0.87≈5945/6821	0.93≈4208/4533
	2016	0.91≈10255/11223	0.90≈4524/5025	0.92≈5731/6198
	2018	0.93≈10357/11167	0.91≈4359/4795	0.94≈5998/6372
	2020	0.90≈9299/10331	0.89≈3961/4445	0.91≈5338/5886
以子女为主体	2014	0.79≈20242/25544	0.78≈10994/14096	0.81≈9248/11448
	2020	0.83≈22467/26983	0.83≈7977/9564	0.83≈14490/17419

样本数据表明中国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的存在比例比较高。不论是时间维度,还是城乡空间维度,老年人中能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大约占到90%,还有一个特征是农村比例稍高于城市;子女群体中,能够给父母经济

①CLASS2014—2018问卷对于子女的信息只统计了前5个子女,CLASS2020则延伸到10个子女,按照本文的归算方法,健在子女数超过5个或10个并得到子女经济赡养的老年人有可能会被化为if_receive=0组,但是这样的个例相对总样本而言占比非常小,不影响总体分析结论。

②在2020年的问卷中,这部分设置为12000—19999元、20000元及以上,这里将其合并。

支持的占比在2014年大约为80%，而2020年则是83%左右，^①也是一个高比例的数据，在中国的城市或农村，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具有普遍存在性。

（二）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绝对强度的描述分析

在上述样本的基础上，只考虑一年内supp_value非零的个体和一年内up_value非零的个体，也就是具有子女经济支持且信息完整的老年人个体和给过父母经济支持的子女个体（见表3和表4）。

在不分城乡的总体样本中，父母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总强度在四个年度的中位数均在3000元左右，平均值则从2014年的4655元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4022元，标准差逐年下降后在2020年上升；分布形态上均为右尾偏长的右偏分布，说明有少数老年人能得到极高的子女经济支持，但高额支持占比在下降，例如10000元以上占比2014—2020年分别为12%、9.5%、8.5%和7.5%，这也是导致均值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3 一年内老年人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描述统计（单位：元）

样本	城市				农村			
	2014	2016	2018	2020	2014	2016	2018	2020
均值	5345	5016	4780	4534	3719	3487	3552	3770
标准差	5841	5425	5007	5268	4280	4218	3960	4956
中位数	3000	3000	3000	3000	2250	2250	2250	2250
25%分位数	1500	1500	1500	1500	1050	1050	1100	1500
75%分位数	6025	6000	6000	5500	4500	4500	4500	4500
高额占比	15.2%	13.7%	11.8%	10.4%	7.5%	6.1%	6.0%	5.7%
样本量	5356	4302	4189	4015	3944	5394	5697	5338

注：高额占比是指一年内得到子女财物共计在10000元以上的老年人占比。

具体到城乡的差异，四个年度的各个分布特征均表现出城市老年人得到子女经济支持强度高于农村，且随着时间变化，城乡间差距在缩小；城市和农村的分位数特征在时间变化上

基本平稳，高额占比均有下降，且城市降幅大于农村，这也导致城市的均值和75%分位数都有下降趋势；同时农村的25%分位数则有上升趋势，反映出农村人口在这几年的经济收入有所改善，以及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不足。以2020年算，城市老年人一年能得到平均为4534元的子女经济支持，农村则为3770元。

从子女自身看，子女一年内给父母财物价值的分布略微左偏，近似对称；在城乡对比上，各特征均显示城市子女给父母的财物高于农村，且赡养强度较农村更为分散；在时间上，城市和农村的均值虽然都有所下降，但是各分位数基本稳定，反映出2014~2020年间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强度没有大的变化，以2020年为准，城市一个子女每年给父母的钱财平均在1000~1999元，农村则为500~999元。

表4 子女一年内给父母财物价值的描述统计

样本	2020城市	2014城市	2020农村	2014农村
均值	3.44	3.85	2.94	3.06
标准差	2	1.67	1.61	1.47
中位数	4	4	3	3
25%分位数	2	3	2	2
75%分位数	5	5	4	4
样本量	7977	10994	14490	9248

（三）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相对强度的描述分析

根据第3部分的思路及定义，对子女经济供养在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的排位做描述分析^②。这里考虑调研期有健在子女且对老年人有经济供养^③的样本个体，CLASS2018中子女供养成为老年人第一主要生活来源的在城市占到8.3%，农村为26.5%；CLASS2014中则城乡分别为18.9%、28.2%。子女供养的第一地位在减弱，尤其城市的下降幅度更大，同时也反映出现代农村中，子女的经济支持仍然是老年人的重要

①如果为了可比性，2020年子女库中只考虑最多有5个健在子女的样本，其经济支持存在比率城市为88%，农村为89%。
②CLASS2020在生活来源排位的问题上缺失严重，例如农村老年人在该问题上的缺失率达到87.5%，因此2020年度不纳入这部分分析。
③有健在子女但对父母无经济供养的个体在CLASS2014和CLASS2018样本中的占比较少，均不到10%，故这部分的删除不会影响结论。

生活来源。再来看子女资助作为第二经济来源在样本中的占比, CLASS2018中城市样本为29.7%, 农村为32.3%, CLASS2014城乡则分别为27.8%和26.8%, 可以看到城市变化不大, 而农村有所增加; 另外这两个年度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作为第二生活来源的老年人占比始终保持30%左右, 于此, 也可以看出当代城市和农村家庭中, 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帮助仍然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五、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存在性和支持强度的建模分析

(一) 模型构建

1. 存在性的模型构建

根据前述的分析思路, 对是否存在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 分成两个样本分别分析: 一是以老年人为主体的样本; 另一个是以老年人的成年子女为主体的样本。

在老年人样本中, 由于CLASS2014、2016、2018年的数据具有个体跟踪性, 属于重复测量数据, 因此将原始数据整理成三年非平衡样本, 并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分析老年人个人特征对存在性的影响, 为此设置老年人个体作为随机因子, 老年人的个体特征作为固定效应, 以if_receive为因变量。按城乡划分其估计结果见表5中的三四列。为保证估算参数能够收敛, 城市样本中迭代次数设置为 10^7 , 熔断 10^5 , 保存步长为500; 农村样本则分别为 5×10^7 、 10^5 和5000。两个模型的参数估计收敛效果很好, 后验概率分布近似正态, 均通过Geweke和Heidel马尔科夫链收敛检验; 另外两个模型的有效样本量也达到了足够大^①, 城市模型在7570~19303, 农村模型在9473~10543之间。

在子女样本中, 以CLASS2018为主要样本, CLASS2014作为辅助对比样本, 以子女在过去

一年内是否给父母财物支持, 即if_up为因变量, 子女特征为解释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 城乡划分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见表6中的第三四列。

2. 支持强度的模型构建

首先考虑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绝对强度, 即receive_value和up_value。在老年人为主体的样本中, 以老年人在一年内得到的子女钱财资助额取对数后为因变量, 老年人的个人特征作为自变量, 使用2014、2016、2018三年非平衡样本建立线性混合效应模型。城市和乡村模型中的迭代次数均为 10^7 、熔断 0.5×10^5 、步长500, 城市模型的有效样本量保持在19853~20510, 农村模型在19900~21026之间, 均通过了Geweke和Heidel两种平稳性检验。参数估计结果见表5中的第五、六列。在2018年的子女样本中, 以up_value为因变量, 分城市和农村分别使用定序logistics回归模型和定序probit模型分析子女特征对经济支持强度的影响, 参数估计结果见表6中的五六列。

其次, 考虑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相对强度, 也就是子女资助在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的地位。以是否第一或第二生活来源为因变量, 老年人的个人特征为自变量, 利用三年非平衡数据建立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 分城乡后的参数估计结果见表7。模型均通过Geweke和Heidel检验, 城市第一、第二来源建模的有效样本量分别在2936~35162、27163~29800; 农村分别为18896~19900、18964~20933。

(二)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1. 老年人样本

在老年人自然特征方面, 越高龄的老人或者女性老人越倾向于得到子女经济支持, 而且高龄农村老人得到子女经济支持多于低龄老人, 城市中的女性老人比男性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强度更高; 从而子女资助在高龄或者女性老年人的生活来源排位更容易排到第一或第二。

老年人的经济收入状况对存在性和支持

^①该模型由R中的MCMCglmm包实现, 尽量遵循参考文献[42]中对有效样本量的要求, 即一般达到1000以上, 最好是10000以上。

强度的影响比较复杂。首先,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等外来经济来源或者经济收入太低的老人或者没有金融规划的老人更容易得到子女支持,例如经济收入变量、社会保障变量都说明了这点,并且无城乡差异,只是乡村的影响强度更高一些。然而,在老年人得到的子女支持强度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方向发生反转,即经济收入越多或者有社会保障或者具有养老金融规划的老人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强度反而越高,与此相呼应的是在思想上养老越倾向于依赖子女的老人,得到子女经济支持力度越低,而且城市和乡村的表现一致。即使如此,外来收入少的老年人,例如没有企事业单位养老金或者城乡保的老年人,以及没有养老金融规划的老年人或者倾向于子女是养老承担者的老年人,子女的经济资助都更可能成为老年人的第一生活来源。此外,非养老金保障的老年人,由于保障程度低,子女资助起到重要的第一填补作用,尤其在城市更明显。与此几乎一致的是,收入越多的农村老年人,子女资助越多体现在第二生活来源上,显示出子女的重要经济补充地位,也进一步体现孝道尊崇在伦理道德上的首要地位。

在子女数量上,如果将子女个数以及父母对子女养老的思想依赖看做子女经济支持的家庭储备,那么城乡都表现出储备越多,老人越容易得到子女的经济帮助,尤其乡村更显著。但并不是子女越多,老年人可以得到的钱财越多,而是存在一个临界值,子女个数低于这个值,子女数量和老年人得到的子女经济支持额度呈正向,高于这个值,则呈负向,即子女个数和老人得到子女经济支持额度之间显示倒U型关系。子女个数也决定了子女资助在老年人生活来源中的地位,城市样本显示,子女越多,子女资助排在第一第二的可能性越大。

从心理特征看,城乡老人和子女间的经济支持都表现出“交换”特征,对子女有向下经济帮助的老人越容易得到子女的向上经济支持,并且老人对子女的经济补助越多,子女给老人

的钱财也相对越多;对子女有经济支持的老年人,老年人得到的净额越多,子女资助成为其第一生活来源的可能性越高;但是对子女没有经济支持的,子女资助更容易排在第二位,尤其城市更明显。

表5 老年人样本建模的估计结果

老年人特征 (自变量)	变量解释	城市(是否得到)	农村(是否得到)	城市(支持强度)	农村(支持强度)
常数项	——	2.643***	2.917**	6.252***	6.244***
年龄	老人的年龄	0.03***	0.041***	-5.828e-5	-0.008***
性别	男(1)、女(0)	-0.449***	-0.688***	-0.125***	-0.005
经济收入的自然对数	被访时前12个月的收入,单位元	-0.15**	-0.211***	0.082***	0.099***
子女个数	老人的健在子女个数	0.027	0.255***	0.465***	0.396***
子女个数的平方	(健在子女个数) ²	——	——	-0.046***	-0.03***
谁是养老主要承担者(顺序变量)	不含子女的角色(0)、政府\子女\老人共同承担(1)、子女(2)	0.079	0.524***	-0.06***	0.006
老人的养老金融规划	有(1)、没有(0)	0.042.	0.039	0.154***	0.271***
是否具有企事业单位养老金	有(1)、没有(0)	-0.795***	-1.38***	0.201***	0.265***
是否有城乡居民养老金	有(1)、没有(0)	-0.3	-0.451*	0.15***	0.233***
是否具备其他保障待遇	有(1)、没有(0)	0.331	-0.615**	0.041	-0.005
对子女有无经济支持	有(1)、没有(0)	1.9***	1.878***	——	——
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度	给子女的钱财物折合金额	——	——	6.683e-5***	1.041e-4***
时间	2014、2016、2018年分别取值0,1,2	0.079	0.194	0.013	0.056***
样本量		9583	10288	8143	9186

显著性说明:***、**、*分别代表显著性水平0.001、0.01、0.05。

2. 子女样本

从子女的自然特征看,女儿比儿子更可能向父母提供经济支持,但在支持强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在子女的排行上,本文只讨论了排行前三的子女,他们对父母提供经济赡养的可能性在彼此间基本相当,差别不大,但在支持强度上,老大要比老二和老三给予的经济支持更多,尤其在城市非常明显,另外排行越小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有降低之势,这是城乡共同点。在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上,城乡均显示子女受教育水平高的反而不倾向于对父母有向上经济支持;但在支持强度上却有着相反的结论,即受教育水平高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强度也越高。

表6 子女样本的模型估计结果

	常数项	2018城市 (是否有过)	2018农村 (是否有过)	2018城市 (支持强度)	2018农村 (支持强度)
子女性别(女性为基准)	男性	-0.21**	-0.273***	-0.057	-0.024
	初中	-0.212	0.032	0.643***	0.299***
子女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为基准)	高中	-0.265	-0.277** (高中及以上)	1.055***	0.412*** (高中及以上)
	大专	-0.29		1.21***	
	本科及以上	-0.612***		1.043***	
	1-199元	2.151***	1.426***	-1.225***	-0.439***
	200-499	1.763***	1.135***	-0.616***	-0.082 •
父母对子女 的向下经济支持 (“没有给过”为基准)	500-999	1.096***	1.141***	0.166*	0.3***
	1000-1999	1.096***	-0.033 (1000及以上)	0.842***	0.985*** (1000及以上)
	2000及以上	1.07***		1.725***	
子女经济状况 (比较及非常 富裕为基准)	基本够用	-0.392***	-0.068	-0.737***	-0.381***
	比较及非常 困难	-1.978***	-1.314***	-0.984***	-0.526***
子女有无工作 (无工作为基准)	有工作	0.203*	0.512***	-0.01	0.099***
子女的居住远 近(本区/县及 以上为基准)	本街道/乡镇	0.121	-0.194	-0.314***	-0.116***
	本村/居委会	0.063	-0.31***	-0.107	-0.134***
	本户	-0.421***	-0.881***	0.036	0.094*
子女排行(老 大为基准)	排行老二	0.011	0.037	-0.262***	-0.04
	排行老三	-0.043	-0.054	-0.355***	-0.123***
	样本量	6336	8725	5396	7529

子女的家庭环境因素上,经济状况越好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概率及强度都越高,并且城市的影响强度高于农村。同样,有工作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概率高于没有工作的,有工作的农村子女更有优势给予父母更高的经济支持强度。子女的居住距离上,城市和农村都显示出不和父母同住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概率高于同户居住的子女,另外农村子女户外居住(在本区县范围内)离父母越远,对父母向上经济支持概率越高,但是城市没有户外距离上的差异。在支持强度上,居住非常远(本区县及以上)的城市子女与最近的子女(本户)对父母有更大经济支持强度的可能性几乎相同,且这种可能性高于居住不远也不近的子女(本村/居委会和本乡镇/街道);在农村也有类似特征。

表7 子女供养成为老年人第一、第二经济生活来源的模型估计结果

老年人特征 (自变量)	变量解释	城市 (第一来源)	农村 (第一来源)	城市 (第二来源)	农村 (第二来源)
常数项	——	2.841*	-3.09***	-8.272***	-4.067***
年龄	老人的年龄	0.024	0.078***	0.09***	0.034***
性别	男(1)、女(0)	-0.316	-0.422***	-0.637***	-0.205*
经济收入 的自然对数	被访时前12个月 的收入,单位元	-1.093***	-0.56***	0.056	0.185***
子女个数	老人的健在子 女个数	0.304***	-0.006	0.164**	-0.047
谁是养老主要 承担者 (顺序变量)	不含子女的其他 角色(0)、政府/子 女/老人共同承 担(1)、子女(2)	0.55***	0.553***	0.695***	0.206***

(续表)

老年人特征 (自变量)	变量解释	城市 (第一来源)	农村 (第一来源)	城市 (第二来源)	农村 (第二来源)
老人的养老金 融规划	有(1)、没有(0)	-0.924 ***	-1.219***	-0.91***	-0.37***
是否具有企事业 单位养老金	有(1)、没有(0)	-3.715***	-1.565***	-0.792***	-0.235
是否有城乡 居民养老金	有(1)、没有(0)	-0.666**	-0.389***	-0.109	-0.483***
是否具备其 他保障待遇	有(1)、没有(0)	0.896***	0.167	-0.496**	-0.792***
对子女有无 经济支持	有(1)、没有(0)	0.737***	0.284**	-0.63***	-0.184*
子女的净经济 支持度	父母得到的子女经 济支持减父母对子 女的经济支持	5.305e-5 **	8.523e-5***	4.869e-5***	2.605e-5**
时间	2014年、2016年 和2018年取值 为0,1,2	-0.006	-0.079	-0.292***	-0.337***
	样本量	8892	9800	8892	9800

父母给子女一定钱物会刺激子女的反哺,但是随着钱物的增加,这种反哺率会降低,并接近父母不给子女钱物的水平,例如2018城市数据中得到父母支持低于200元的子女其赡养胜率比没有得到的高出8.6倍,父母支持在200~499时此数据为5.8倍,在500到2000及以上时则降为大约3倍;农村数据中1000以内的三个档则分别为4.16倍、3.1倍和3.1倍,1000元以上时更是掉到和基线同等水平,总起来类似倒V型。然而,在支持强度上,若以“父母没有给过该子女钱物”为基准,父母给子女的钱财较低时,对应的子女给父母的高额经济支持的概率要低于基准线,当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超过大概500时,这一概率才超过基准线并随着向下支持额度的增加而升高,城乡都显示出这种V型特征。

六、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第一,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的现状。首先样本描述分析认为,在当代中国孝道文化的传承仍然是良好的,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具有广泛普遍性。本文的比例数据虽然和其他文献有差异,但是比较接近2021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公报数据,例如样本显示2020年有大约90%的老年人(子女健在者)都能得到子女经济支持,2021年公报数据为65.6%,但是本文分析该比例的主体是子女健在的老人;另外,在本文样本中子女对父母

的经济支持行为发生率在80%~83%间,与公报中有87.2%的老年人认为子女孝顺基本一致;2020年老年人得到的年均支持强度在城市和农村分别为4534元和3770元,与2021年公报数据5006.8元和3279元接近,据此样本分析结论可信度较高。其次在经济支持的绝对强度上,2014年到2020年有下降趋势,城市降幅较明显,农村围绕3700元起伏不定;绝对强度的分布特征,如中位数、25%和75%分位数在这四个年度基本保持稳定;但是高额数据的占比有逐年减少趋势,从而带动年均支持强度下降,这可能要受益于当前老年人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的完善,给子女的高额养老负担减轻压力。经济支持的相对强度也有下降,且城市下降速度更快,而这主要是因为老年人人均年收入的大幅增加。本文中相对强度可以考察绝对强度在老年人收入中的比例,一方面,2014年到2020年绝对强度有小幅下降,另一方面,作为分母的人均年收入则有大幅上升,2014年城镇老年人人均收入23290元,农村7621元,而到2021年分别增长为47270.8元和14105.4元^①,这种增长幅度远远大于子女经济支持的下降幅度,二者的综合作用使得相对强度的下降明显,在人口普查等这类宏观数据上更能够体现出来。

另外,子女经济支持依然是农村老年人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是城乡老年人的重要补充来源。以本文2020年绝对强度中位数与2021年老年人年收入中位数(2021年公报数据)相比,城市和农村分别为10%和40%^②;以子女经济支持作为第二生活来源的老年人,2018年在城乡均占到大概30%。

第二,老年人个体特征对子女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基于老年人样本,将老年人特征划分为个人收入、双代经济往来特征及子女储备三个层面,进一步总结得到这些个人特征如何影响子女经济支持行为的存在性及强度,并从理论机制上给予解释。

首先在经济收入层面,自己劳动收入、子女的财物资助和其他外部来源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构成模块,子女资助和其他两个模块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和老年人个体特征之间的关系。老年人能够通过自己劳动得到收入,就要求有一定劳动能力,因此高龄或女性老年人就会受到阻碍,在没有养老金或其他主要外部收入来源或者社会保障比较低时,子女的赡养首当其冲,此时老人没有任何养老金融规划,对子女的养老期望也较高,子女经济支持很容易成为老年人的第一生活来源;反之,当外部经济来源或自我收入比较丰富时,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可能性及相对强度都下降,这时我们就看到宏观上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地位下降。根据上述可以推断出,子女对老年父母经济支持的存在性和相对支持强度在理论上主要源于子女的责任内化论和需要论;同时显现的是外部经济来源对子女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然而,在子女资助的绝对强度上,与老年人的外部经济来源或自我劳动收入则呈正向关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挤入效应”,此时更多地体现了交换论。

另外,在农村,收入越多的老人其子女资助越容易成为老人的第二生活来源,在城市,反而是没有给过子女钱的老年人,子女的财物资助往往会成为他的第二生活来源。这衬托出子女经济支持在我国老年人的经济赡养中重要的填补作用和深深浸入的孝道文化。

两代人的经济往来更能够直接体现交换心理,老人的向上经济支持和支持力度都对子女的反馈行为及力度给予正向影响;并且给过子女钱对子女有向下经济支持的老人或者这种经济往来中得到净额越多的老人,越可能将子女资助视为最主要的第一经济依赖。

子女数量对子女经济支持的存在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是城乡共同点,也是孝道文化存在感的体现。子女个数和老人得到的子女经

①2014年和2021年老年人人均年收入分别来自第四次和第五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公布数据。

②城市和农村分别为3000元/28800元 $\approx$ 10%,2250元/5640元 $\approx$ 40%

济支持额度之间显示倒U型关系,并不是子女越多老人得到的财物也越多;子女数量对子女经济支持相对强度的影响则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城市中子女越多,老人获得的子女资助越容易成为主要经济来源,而在农村,子女数量对第一、第二来源的影响还可能出现负向作用,但是统计上不显著。由此可以猜测,所有子女给的钱财总额应该是达到满足老人生活需要即可,不会超出太多,而且若某个子女给够这个钱,其他子女给的钱就会相对减少,这也许缘于农村子女的经济状况普遍低于城市。

第三,子女个体特征对子女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基于子女样本,子女是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的主体,是子女代际经济支持行为的发动者和行动者,了解他们的赡养特点才有助于明确老年人家庭经济供养在未来的决策方向。在我们讨论的子女特征中有些是子女本身不能决定的,如性别、出生排行、老人对该子女的经济支持等,而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居住地和有无工作等因素相对可以外控,并且受教育水平高、有工作、较远的居住地(农村)一般都会指向良好的经济状况,因此宏观上提高青年劳动力的就业率和受教育水平,使他们有稳定的经济收入,都会间接地促进微观上子女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和加大经济支持力度,当然前提是我们整个社会依然要有孝道文化的浸染环境。

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首先在支持行为上,父母的支持力度和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概率之间显示倒V型,更多地体现出交换理论,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倒V型的右尾巴,父母过高的向下经济支持,反而抑制了子女对父母的向上经济支持,也是需要论的反向解释,即老年人经济状况很好,不需要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也就不会再给父母钱^①。其次,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与父母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力度形成正

V型关系,V型的左翼、中间及右翼分别集中体现了需求理论、填补理论和交换理论。

(二) 讨论

首先,从以上结论可知,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行为的存在性和支持强度在当代社会的表现不同,另外,老年人或子女的同一个个体特征对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存在性、支持的绝对强度和相对强度的影响也存在差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学者在同一问题上得出挤入或挤出等不同的答案。这说明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某个特征对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如何如何,而要从不同角度细化这个问题,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行为的存在性是家庭经济供养文化模式的体现,而赡养强度则是行动上的折射,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其次,子女对父母经济支持行为的存在性和支持强度在理论上存在不同的解释,可以大体认为,责任内化论是中国现代社会中不论城市还是农村依然广泛存在子女对老人经济供养行为的文化核心,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孝道文化的刻骨铭心;而子女代际经济支持绝对强度的分析更多地反衬交换思想,相对强度的分析则映射出需要论和子女的填补功能,强度的下降说明它们会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外部影响,也即行为方式的改变。从中也看到,老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体现的是责任内化论、需要论和交换论等多种理论思想的交织,不能单一地强调其中的任何一个。

再次,老人或子女的个人特征给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行为及强度带来一些影响,城乡间的差异更多体现在影响强度上,在影响方式上二者基本一致或基于城乡间经济状况的差异而导致不同的影响方式,因此当城乡经济相当时,老人或子女做出的反映应该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杜鹏,武超. 1994—2004年中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

^①此时子女家庭的经济状况也不一定是非常困难,例如2014城市子女样本中,得到向下经济支持在2000及以上的子女个体有1374个,其中42%属于富裕子女,46%属于子女家庭基本够用,只有12%属于子女贫困。

- 源的变化[J]. 人口研究, 2006(3): 20-24.
- [2]郭春燕. 我国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替代效应的城乡差异和时间性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9(1): 105-125.
- [3]姚远. 中国家庭养老研究述评[J]. 人口与经济, 2001(1): 33-44.
- [4]BLAU P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M]. New York: John Wiley. 1964.
- [5]张新梅. 家庭养老研究的理论背景和假设推导[J]. 人口学刊, 1999(1): 57-60.
- [6]王向清, 杨真真. 我国农村地区孝道状况分析及其振兴对策[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2): 84-92.
- [7]王涤. 关于中国现代新孝道文化特点及其功能作用的探析——兼论提倡新孝道文化中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 人口研究, 2004(3): 76-81.
- [8]叶光辉. 华人孝道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9(32): 101-148.
- [9]袁佳黎, 刘飞, 张文宏. 孝道观念、代际支持与青年群体赡养行为的变迁: 2006-2017[J]. 中国青年研究, 2022(1): 93-103.
- [10]熊跃. 需要理论及其在老人照顾领域中的应用[J]. 人口学刊, 1998(5): 31-40.
- [11]CARDIA E, MICHEL P, Altruism.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of time and beque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 Control, 2004(28): 1681-1701.
- [12]KÜNEMUND H, MOTEL-KLINGEBIEL A, KOHLI M. Do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from elderly parents increase social inequality among their middle-aged children? Evidence from The German Aging Survey [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Social Sciences, 2005(60B): S30-S36.
- [13]桂世勋, 倪波. 老人经济供给“填补”理论研究[J]. 人口研究, 1995(6): 1-6.
- [14]ELIZABETH F, LEE L, ROBERT J W. Patterns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in southeast Asi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2, 64(3): 627-641.
- [15]KANG S J, JEON H J. A study on the motivation of private transfer income and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f public transfer income [J]. Public Economics, 2005, 10(1) : 23-46
- [16]SCHOENIR F. Private interhousehold transfers of money and time: New empirical evidence [J].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1997(43) : 423-448.
- [17]张文娟, 李树茁. 劳动力外流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04(8): 34-39.
- [18]曹子坚, 吕萃茜. 家庭结构、空间距离与居家养老[J]. 北方金融, 2022(5): 23-30.
- [19]刘岚, 齐良书.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支持及相关因素研究[J]. 西北人口, 2020(4): 1-14.
- [20]宁满秀, 王小莲.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5(5): 21-33.
- [21]陆杰华, 郭荣荣. 子代孝道类别对亲代福祉的影响探究——基于CFPS2014的实证检验.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3(1): 135-146.
- [22]汪雯婧. 老年人获得子女代际支持现状及影响因素[J]. 科技和产业, 2024, 24(15): 116-121.
- [23]陈佳. 我国家庭代际支持的子女性别差异——社会养老资源的调节作用[J]. 西北人口, 2021(6): 99-112.
- [24]张文娟. 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 人口研究, 2012(5): 68-80.
- [25]ZIMMER Z, KWONG J.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J]. Demography 2003(40): 23-44.
- [26]GILES J, WANG D, ZHAO C. Can China's rural elderly count on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Implications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Ageing 2010(3): 183-204.
- [27]田北海, 徐杨. 成年子女外出弱化了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养老支持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0(4): 50-69.
- [28]王梅, 夏传玲. 中国家庭养老负担现状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1994(4): 37-43.
- [29]王小增, 王林萍, 宁满秀. 新农保参与、劳动力迁移与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当代经济管理, 2020, 42(6): 33-39.
- [30]江维国, 刘文浩. 基本养老保险、双代个体特征与家庭双向代际支持——基于CHARL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J]. 重庆社会科学, 2021(11): 91-105.
- [31]阎茂瑶, 纪杰. 新农保对双向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0, 31(7): 269-272.
- [32]王芳, 李锐. “新农保”对“家庭养老”替代性的地区差异分析——基于CHARL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保险研究, 2016(12): 114-123.
- [33]张磊, 邓紫琪. 老有所医与老有所依: 医养结合政策的代际经济支持效应[J]. 中国人口科学, 2025, 39(1): 76-93
- [34]杨忻, 张迺. 长期护理保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 卫生经济研究, 2025, 42(6): 45-50.
- [35]孙鹃娟, 田佳音, 陈雨欣. 替代还是补充? 居家养老服务对中国老年人代际支持的影响效应[J]. 人口研

究, 2023, 47(6): 35-50.

[36]张海峰, 林细细, 张铭洪, 子女规模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互相卸责or竞相示范[J]. 人口与经济, 2018(4): 21—33.

[37]刘岚, 齐良书. 中国城市家庭代际支持及相关因素研究[J]. 西北人口, 2020(4): 1-14.

[38]丁志宏, 王天正. “成龙成凤”的独生子女会提供更多家庭代际支持吗? ——基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6, 32(1): 83-94.

[39]顾永红, 刘宇. 代际补偿与有效供给: 社区代际互助养老长效运行机制探索[J]. 社会保障研究, 2023(5): 25-36.

[40]张召华, 王蕾, 罗宇溪. 新农保可以替代农村家庭养老吗? ——基于子女结构差异的断点回归[J]. 经济经纬, 2018, 35(4): 23-29.

[41]YAO L P, ZHEN C.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their financial transfers to ageing parents in rural China: Mothers and fathers' strategic advantages in enforcing reciprocity [J]. Ageing and Society, 2020(40): 896-920.

[42]PIERRE V. Estimation of a biological trait heritability using the animal model—How to use the MCMCglmm R package [J]. Tutorial, 2012(10).

【责任编辑 史 敏】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in Contemporary China: Existence and Intensity Analysis

GUO Chunyan

Abstract: To examin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adult children's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ir elderly par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this study analyzes data from the four waves of the 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 (CLASS) conducted from 2014 to 2020. It introduces a novel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existence, absolute intensity, and relative intensity of upwar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First, financial support from children to parents remain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China, with no significant urban-rural disparity in its prevalence. The decrease in absolute intensity is primarily attributable to a reduction in high-value monetary transfers from children, whereas the decline in relative intensity largely stems from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the elderly's own economic resources. Second, the existence of upward financial support reflects the cultural paradigm of filial piety and is theoretically grounded in the internaliz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intensity of support quantifies children's economic support behaviors, with absolute and relative intensities corresponding to micro- and macro-level measurements, best explained by exchange theory and needs theory,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e of the sam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varies across these three dimensions. For instance, the income level of elderly parents demonstrate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both the existence and relative intensity of children's support, while for absolute intensity it reveals a crowding-in effect explained by exchange theory. The number of children serves a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istence of their support. The relationship with absolute intensity follows a non-linear, inverted U-shaped pattern, while the impact on relative intensity exhibits notabl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The two-way financial exchange between generations is complex, exerting distinct influences on the existence and intensity of support respectively. Third, the urban-rur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thes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upward financial support are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e magnitude of influence, whereas the direction of influence remains largely consis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some cases, differences arise due to urban-rural economic disparities.

Keywords: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existence; support intensity; urban-rural disparities; 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